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5.03.011

钱镠传说的英雄主义叙事及人格建构

霍 明 宇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中国文化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 要:钱镠是吴越地区的重要历史人物,关于他的传说故事呈现出某些英雄主义的叙事特征。围绕着钱镠这一载体,叙事者将客观现实与艺术想象融合,赋予主人公神异化的特质和超自然的力量,暗示其肩负“天命”的英雄身份。同时,叙事过程中突出道德、人格的建构,以及特定的民俗、地域文化在主人公身上的转化,这些都展现了英雄人物成为族群精神符号的象征,也折射出不同叙事主体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在相关叙事中,将主人公的“天命”与“人格”之间建立关联,暗示着某种因果逻辑的存在,即主人公所拥有的符合正统价值的人格特质,契合民俗民情的道德观念是他被赋予英雄天命的原因。由此,英雄人物所代表的理想人格也就成为凝聚族群的精神图腾,维护着族群的文化认同和传承。

关键词:钱镠传说;英雄主义叙事;人格建构;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5)03-0075-06

有关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王钱镠的传说故事,被大量记载于各类史书方志、笔记小说等典籍文献中,同时也流传于民间艺人的口头创作、采集和录写中,逐渐衍生成一个时间上自五代至今跨越一千余年,地理位置以临安为中心,辐射至周边的传说群,其传播体量之大在历代帝王传说中并不多见。在历代的传说故事中,钱镠既是出自草莽的赌徒无赖,又为中央政权平定叛乱的贤能功臣,他智勇无敌、战无不胜、造福百姓,最终则功业建成,得到正统文化的认可。作为历史英雄人物,钱镠的英雄人格折射着世人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是民族深层文化、观念和价值传承的载体。钱镠故事的英雄主义的叙事框架,呈现出不同叙述者的精神建构和价值认同。

一、英雄人物的神异化叙事

古代英雄主义母题的叙事,往往呈现出一些类型化的特征,其中将历史人物神异化的叙事方式十分常见,体现为主人公出身的神异性、出生被弃及天赋异能等。在这类叙事中,英雄诞生的异相起初往往被视为一种不祥的征兆而遭到质疑,甚至被置于生死存亡的危机中,但虽处险境却又

幸运地得到天地仁人的庇佑存活下来,暗示着其顽强的生命力,为日后创造出不朽功业埋下伏笔。英雄人物往往在出生伊始即被预示着非凡的身份,而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更呈现出神异化的特质,建功立业如有神助,这样的叙事方式一方面增加了故事的奇幻性和对受众的吸引力,同时,也受到了古代“天命”观以及“君权神授”等观念的影响,暗示着主人公的英雄身份具有某种天赋的合理性。

(一) 出生神异

在历代关于钱镠的传奇故事中,会把钱镠的出生类比为神异的弃儿事件,采取神异化的叙事方式。这在宋人钱俨编写的《吴越备史》中较早提及:“先是五年,邑中大旱,邑令命道士东方生起龙以祈雨,生曰:‘茅山前池中有龙,然不可起,起必大异。’邑令乃止。明年复旱,又召东方生起龙,将临池,遂指王所居曰:‘池龙已生此家矣。’时王已诞数日。始诞之夕,皇考方他适,邻人急走告曰:‘适过君家后舍,闻甲马之声甚众,非有盗乎?’皇考乃驰归,王已诞矣,复有红光满室,皇考颇怪之,将弃之井,祖妣知非常人,固不许,因小字曰‘婆留’。”^{[1]6-7}故事中,钱镠的诞生与神龙相关

收稿日期:2024-10-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基于儒家仁学思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22BKS196)

作者简介:霍明宇(1978—),女,北京人,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联,暗示其拥有天赋异能,是担负着重要使命出生的重要人物。

明清的笔记小说则多将钱缪的降生描绘成蜥蜴转世。明代周清原的《西湖二集》有云:“临产之时,父亲走到灶下取斧劈柴烧汤,见一条丈余长的大蜥蜴,似龙非龙之状,抢入室中,父亲老大吃惊,随步赶进,忽然蜥蜴钻入床下,即时不见。随产个小儿下来,满室火光,惊天动地。邻家都来救火,及至走进钱家,又不见一点火光,人都以为怪。父亲说生了一个妖怪,要投井中淹死。亏得隔壁一个婆婆勉强挽留得住,因此取名为钱婆留。”^{[2]4-5}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等文献中。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蜥蜴被视为无角之龙、民间祈雨的神。钱缪作为吴越一地之王,相对于中央政府依然是臣子身份,故事中没有把钱缪与龙王类比在一起,但仍与似龙非龙的蜥蜴做了关联,也是意在昭示其具备王者天赋。

(二)非凡身份的预示

不仅降生如此,及至钱缪的成长过程也伴随着各类神异的想象。借助这样的叙事,为日后非凡身份的彰显埋下伏笔。《西湖二集》有云:“四五岁时,里中有一株大树,他(钱缪)因与群儿戏耍,便走到大树之下,坐于石上,就像帝王一般,指麾这些儿童,征战杀伐,各有队伍,号令严明,儿童都惧怕他,不敢不遵其约束。临安东峰有块圆石,其光如镜,名为石镜山。钱缪自己照见头上冠冕,俨然王者之状,回家对父亲说了。父亲只道他说谎,同他走到石镜前一照,委是如此,恐惹出是非,就对石镜祷祝道:‘倘日后有如此之福,愿神灵不要照见,省得是非。’祝罢,便从此照不见。父亲暗暗欢喜。”^{[2]5}《古今小说》中也讲到,钱缪五六岁时头角渐异,相貌伟岸,臂力非常,与里中小儿玩耍,十几岁的大孩儿也弄他不过,只好让他为尊。及至十七八岁时,更是身长力大、腰阔膀开,十八般武艺不学自通,因喜拳棒结识了钟明、钟亮二兄弟。一次钟家二兄弟收到钱缪宴请邀约,不想进到堂中却看到一条大蜥蜴踞在床上,头生两角,五色云雾罩定,二人大喊“作怪”,便把云雾冲散,不见了蜥蜴,却见钱缪躺在床上酣睡。钟家二兄弟暗自念到,异人多有变相,此人后来必有些好处,便与钱缪结桃园之义^{[3]303}。

此外,从宋代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开始,到后来历代的笔记小说,几乎都会讲到民间术士观天象而探知钱缪王者之气的传说。《新五代史》

中这样写道:“豫章人有善术者,望牛斗间有王气。牛斗,钱塘分也,因游钱塘。占之在临安,乃之临安,以相法隐市中,阴求其人。……术者过起家,缪适从外来,见起,反走,术者望见之,大惊曰:‘此真贵人也!’”^{[4]941}这类传奇故事又是借助能参透天机的术士之口,暗示钱缪身份的非凡。

(三)历史功绩的神异化

钱缪成为吴越王后,致力于治理钱塘江潮的水患,这一部分历史功绩则被衍生成带有神异味道的“射海潮”的传奇故事。宋代《枫窗小牍》记载:“杭州江堤筑自梁开平四年八月,时钱氏始伯,武肃王以候潮、通江二门之外,潮水冲啮、版筑不就,命强弩数百射之,潮水为避,击西陵。遂以竹笼石,植大木围之,率数岁辄复坏。”^{[5]15-16}强弩射潮能使潮水为之躲避,这显然是后人神话般的想象,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叙事者心中对钱缪解决江潮之患这一盛举的赞叹,以及百姓对钱王为民除患的拥戴。钱王射潮也成为千余年来流传在江浙一带家喻户晓的传说,后人甚至在江边建造钱王射潮的雕像以示纪念。

此外,钱缪“八百里”智取黄巢也是在很多笔记小说中都有提及的传说。例如《西湖游览志余》中讲到,唐代乾符二年,黄巢率众数千攻掠浙东,逼近临安。钱缪于是率领劲卒二十人,埋伏在山谷中,待黄巢兵至,带兵伏弩射杀其将,制造了一场兵乱。随后,钱缪引兵到“八百里”这个地方,叮嘱路旁的老妪说,如有黄巢哨兵前来探问,就说钱缪兵屯“八百里”。黄巢果然派遣哨兵打听,听到老妪所言,不知道“八百里”是一个地名,误以为钱缪屯兵长达八百里,就引兵撤退了。这段传奇显然把钱缪的智勇形象夸大、神化了,但钱缪的智勇形象却因此留在了后人心中^{[6]3}。

不仅史籍文献中有诸多神异化的描写,在民间口头传说中更有一系列奇幻的叙述,例如钱缪征讨唐末藩镇割据势力刘汉宏的战争就是这样。据口述者说,当时刘汉宏正把持着定海一地,与钱缪隔海对峙。钱缪欲渡海发动征讨,但遇上海涨大潮,迷雾漫漫,无法行进。情急之下钱缪抓起一把沙子向大海抛去,谁知这一撒,翻滚的海浪居然平静下来,海面上出现一条由沙子铺就的道路,一直通向定海。钱缪大军就这样直捣定海,在大雾的掩护下,一举平定了叛军刘汉宏^{[7]247}。

将历史人物神圣化是古代英雄人物叙事中常见的模式。这种将英雄功绩与天命绑定的叙事框

架,一方面来源于早期人类通过幻想与艺术加工解释自然与社会现象的思维模式;另一方面,也体现着古代以“天命观”为基础,构建和维系宗法社会运行规律的意识形态。

二、英雄叙事中的理想人格建构

如前所述,历史英雄人物的神圣化展示了“天命所归”的叙事逻辑,而与此同时,英雄故事中对人物道德观念、人格特质的建构、弘扬,又促成了一种“天命”与“人格”之间的对应关系。英雄人物必然拥有符合、维护宗法制度的政治观念,同时也呈现着为百姓所认同的世俗民情和价值伦理。这里的叙事逻辑是,因为他们代表着所在文化中普遍认可的理想人格,所以被赋予成为英雄的“天命”。他们早年经历中道德的转变和重构,也喻意着英雄命运的轨迹是由正统道德与普世文化观念所决定的。

(一)英雄人生的道德转变

叶舒宪先生曾总结东西方英雄主义叙事的共同特征,其中一条提到“主人公道德的转变”。他举例说,像羿和吉尔伽美什这样两位智勇双全的神人,起初都没有把他们的特异禀赋用到正路上,但在后来的生涯中,都经历了一番洗心革面的道德转换:从荒淫残暴、不修民事到为民除害,建功立业^{[8]100-117}。值得注意的是,在钱镠传说故事中也可以找到此类的叙事模式。关于钱镠的身世,在正史中的描述,如《新五代史》中,称他贩盐为盗。到了明清小说家的笔下,钱镠更成了一个吃酒赌钱的泼皮无赖。明代冯梦龙的《古今小说》中这样描述:“再说婆留到十七八岁时,顶冠束发,长成一表人材。生得身长力大,腰阔膀开,十八般武艺,不学自高。虽曾进学堂读书,粗晓文艺,便抛开了,不肯专心,又不肯做农商经纪。在里中不干好事,惯一偷鸡打狗,吃酒赌钱。家中也有些小家私,都被他赌博消费得七八了。爹娘若说他不是,他就憋着气,三两日出去不归。因是管辖他不下,只得由他。”^{[3]299}

但就是这样一位无赖,日后却逐渐走上了正途,成为制胜沙场的将军、雄霸一方的侯王。正史中的钱镠是一位智勇无敌、功勋卓著的贤能忠臣。在五代军阀混战的局面中,他先是跟随董昌讨伐黄巢,后又在董昌透露出僭越野心时,以守正之名训诫和征讨董昌。他奉命平定叛贼刘汉宏,除去了威胁浙西、浙东的最大隐患,保障了朝廷的统一

和杭州百姓免遭战争涂炭,得到了上自朝廷下至黎庶的认可。钱镠征伐刘汉宏的行为被视为维护正统的正义之举。《西湖佳话》中写到钱镠与刘汉宏江边对阵时,训斥刘汉宏道:“‘汝本一盗耳,蒙朝廷准降,加以显职,此莫大之恩也。汝今既知以观察妄自尊大,便当思圣命,止敕观察浙东,如何两番遣将,窥我浙西?须知浙西名自有主。汝既以知犯我,则浙东越州,吾岂容汝安坐?’说罢,早一匹马,一杆枪,劈面冲来。刘汉宏的先锋穆用见了,只得横刀截战。战不数合,早被钱镠一枪刺于马下。”^{[9]138}这一回合,既占尽道义,又打得气势恢弘。

从鸡鸣狗盗之徒到兴邦立国的明君,这种形象特征的转变与叙事模式背后也隐含着某种价值建构。无论在官修史书的叙事视角下,还是民间文人百姓的叙事话语中,这样一位明君的形象既符合正统思想的价值观念,也符合百姓的期待。一旦钱镠把自己的超然才能运用到尽忠、尽孝上面,从统治阶层来看,他就是一个维护正统的功臣;在市井百姓来看,他则是一个爱民如子、光宗耀祖的乡人。而出现这样一种身份的转变,又似乎暗示着,英雄人物的命运是随着正统思想和民心的向背发生转变的。虽然正统思想和民心向背所指向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拥有一种潜在的指引力量,似乎暗示着一个可以信奉的规条:正统思想和民心向背拥有着指引历史人物命运,以及掌握历史风向的强大力量。正如叶舒宪先生所指出的,这种从叙事和内容上看不符合逻辑的现象(即主人公道德的转变),在神话和民间故事中屡见不鲜。它体现着某种叙事的形式逻辑:主人公的弃恶从善的终极原因往往都在于民心的向背,即英雄道德上的转变符合城邦民众的要求,他们需要一位好国王取代暴君^{[8]117}。因此可以说,是叙事主体的道德期待在形塑着这样一种英雄人物命运的转变,昭示出叙事主体内在的价值建构,即成为英雄需要符合正统文化的道德要求。

(二)符合儒家价值观念的理想人格

在有关钱镠的叙事中,对正统儒家思想的建构尤其突出。在功业追求上,钱镠攻伐征战多年,开创并奠基了吴越国的基业,成为一代英杰。而在德行方面,他谨守君臣之道,怀有仁人爱民之心,保障了吴越之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民生富庶,这些都令其成为符合儒家理想人格的典范。

钱镠受封于朝廷被封为吴越王,最终衣锦还乡,得到乡党宗族的拥戴,可以说是实现了儒家文化中的至高荣耀。回顾传说故事中的钱镠形象,从草莽无赖到一代侯王,最终得到正统文化的接纳认可,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场符合儒家正统文化的修身之道。所谓“昔年盐盗辈,今日锦衣人”。《旧五代史》文末对钱镠一生的评价很高,称他位极人臣,名高简册,并以帝王的礼仪葬之。“制曰:‘……宜令所司定谥,以王礼葬,仍赐神道碑。’谥曰武肃。”^{[10]1771}在击退刘汉宏、平定董昌叛军后,钱镠被唐昭宗封爵,且赐予丹书铁券以示嘉奖,并称赞他有儒者之风。

钱镠的儒家理想人格形象主要体现在忠、孝上。首先是忠。钱镠早年追随董昌平定叛乱,后因董昌背叛中央,自立为帝,而与之决裂,亲自率军讨伐。随后,钱镠逐步掌控浙东、浙西,势力大增,此时,曾有人建议钱镠自立为王,却遭到拒绝^{[1]80}。后梁开平元年(907年),朱温建立梁朝,封钱镠为吴越王。又有臣属劝钱镠自立为王,拒绝梁朝册封。钱镠以孙权自比,表示“吾岂失为孙仲谋耶”?据说,梁朝灭亡后,有农人在耕地里发现了一块传国玉玺献给钱镠,钱镠亦不接受,而是献给了唐王^{[1]153}。可见,钱镠始终谨守“名分”,对僭越称王极为谨慎,甘愿效忠于中原王朝,以换取统治的合法性。其次是孝。在江浙一带的民间传说中,广泛流传着有“钱王背娘”的传说。据说钱镠成为吴越国王后,便把他母亲从临安老家接到了杭州,欲使其安享晚年。不料母亲水土不服,导致旧疾复发。钱王急请名医诊治,亲自侍奉汤药,每天赤脚背着母亲到楼下院子里晒太阳。因此,民间有了“依要孝敬爹娘,学学钱王背娘”的谚语。

儒家文化强调宗族认同,一个人取得功业是光宗耀祖的壮举,要敬告祖庙。而衣锦还乡就是敬祖的直接体现。在历代文献中,钱镠还乡的场面描写极其隆重,家乡的山林树木都披挂锦带,一路开锣喝道。《古今小说》中记载,钱镠功业建成后荣归故里,把儿时成长的痕迹全部以“衣锦”名之:“钱镠叹道:‘闻古人有云:富贵不归故乡,如锦衣夜行尔。’乃择日往临安展拜祖父坟莹,用太牢祭享,旌旗鼓吹,振耀山谷。改临安县为衣锦军,石鉴山名为衣锦山,用锦绣为被,蒙覆石镜。设兵看守,不许人私看。幼时所坐大石,封为衣锦石,大树封为衣锦将军,亦用锦绣遮缠。风雨毁

坏,更换新锦。旧时所居之地,号为衣锦里,建造牌坊。贩盐的担儿,也栽个锦囊韜之,供养在旧居堂屋之内,以示不忘本之意。杀牛宰马,大排筵席,遍召里中故旧,不拘男妇,都来宴会。”^{[3]320}而钱镠在衣锦还乡后也发出焉敢忘本的感叹,奉行敬天法祖的宗族理想。从为国建功,到为君尽忠,到为民立德,钱镠传说中对钱镠形象的塑造符合古代儒家理想人格,而这也成为英雄传奇叙事模式的一条主线。

三、英雄人格的地域化和民俗化

有关钱镠的故事集中地出现在临安及其附近地区,并且,传说内容侧重于铺叙钱镠和吴越当地的风物人情,表现出主人公的亲民品质。特别是在口头传说中,更有相当多的故事是将吴越地区的地名地貌、民间风俗、道德信仰附会在钱镠的生平事迹上,经过一番带有神话色彩的演绎,使得钱王和吴越地区的风物人情被赋予了某种神秘而亲切的连接。在这些叙事中,钱王之于吴越百姓而言,更像是守护这方水土的父母神。

将某一地域出现的英雄人物与该地域的特定地名风物、民俗民情关联在一起,创造出凸显地域特征的民间故事,体现了民众对英雄人物进行不断建构的需要,也是对官方叙事的解构和再造。钱镠从藩镇统领到治水潮神等身份的转换,体现在民间叙事中,通过民间建构将神格化的历史人物融入地方风物,再演变为地域信仰,最终固化为族群共同记忆的叙事逻辑。

(一)地名风物的人格化

在民间传说中,钱王常常以一个挑着扁担的盐贩形象出现,他被描述为一个力大无比的神人,能为地方百姓解决棘手的难题,为百姓建造、维护适合生活的地理空间。有一则传说是这样讲的,浦阳江下游萧山与诸暨交界处有个叫兔石岭的湾,山洪到此一个急转弯直泻入临浦,至渔浦进入钱塘江。每逢山洪时节,洪水至此被堵,就冲塌江堤,冲毁萧山、诸暨两县的田地和村庄。两县百姓深受其苦。只得望天焚香,祈求钱王早日来到此地搬掉兔石岭。终于,钱王听到了百姓的祈祷,抡起铁扁担左右开弓打两边的山岩,山岩果然裂开,兔石岭被分成两壁,为江水开辟了一条宽宽的通道,从此,兔石岭不再阻挡水流,被钱王劈开的山岩还成了江水的天然江堤^{[7]255}。

还有很多地名被附会在钱镠的生活日常中,

拥有了生气和灵动。有一则说到,在钱镠 24 岁那一年,他为了多赚些银钱,挑着好几百斤重的盐担,乘着朦胧的夜色走山路,不料脚底被丢在地上的一堆西瓜皮滑了一下,就这样打了一个跟头,扁担上下耸动,盐筐忽高忽低,只听“啪嗒”一声巨响,鳝骨扁担折成两截,往远处飞去,而两头的咸盐,被甩过小溪,一头落在盘坞垄边,一头落在大官山下,变成了两座孤立的岩石山,据说这就是至今还矗立在锦溪边的画石岩与石镜山。而扁担折断之后飞得很远,成了今天距临安市各有二三十里的乌渡村和三口乡的扁担岭^{[7]112}。还有一则传说,钱镠小时候和几个小伙伴在村北的一座石桥边玩耍,当时河边的一棵芭蕉树把小孩子的脸弄得痒痒的,钱镠突然看着芭蕉叶说,自己能用芭蕉叶作刀在石桥上砍出三道口子。众伙伴不相信,哄叫着钱镠让其兑现。只见钱镠一个箭步冲上桥头,举起两尺来长的芭蕉叶,狠劲儿地朝着一尺多厚的石桥连砍三下,顿时火星四溅、碎石横飞,石桥晃动,众人吓得目瞪口呆,等回过神来,才发现石桥上果然留下了三道深深的刀痕。后人为了纪念这件事,就把这座桥叫作“三刀桥”^{[7]117}。这些传说把生活日用赋予灵性,折射出朴素的万物有灵思想在先民心中留下的印记。而其中的故事情节也颇有百姓日常生活的色彩,把吴越的地形地貌附会在吴越王身上显得亲切可爱、生动有趣。

(二) 民俗民情的寄托

很多流传在当地的民俗民谣、风土人情也会被附会成钱王的故事。例如每年朗碧村舞黄龙的民俗,在民间的叙事中就跟钱镠有关。据说钱镠的妻子戴妃娘娘回老家朗碧村省亲时,赐给娘家人一条黄绢做的布龙来舞,村里人都非常看重这条黄绢龙,把它请进祠堂和祖宗放在一起,只有重要节庆的时候才会拿出来舞。黄绢龙也好似有了灵性,通体金光四射,直冲九霄,成为远近闻名的稀世珍宝。但不想却被一伙强盗盯上,几次三番来村里抢黄绢龙。后来钱镠得知此事,派出将领王总兵带一队精兵与强盗激战,战斗中强盗头目被王总兵用剑钉死在石壁上,而王总兵也摔下悬崖战死。强盗虽退,为了避免再有不轨之人觊觎黄绢龙,族人决定把黄绢龙藏于护龙寺旁边的一口大井中,钱镠亲自书写“接龙井”三个字。以后每次需要舞黄绢龙的时候,人们都要先到护龙寺请得道高僧为黄绢龙开光抹身,舞龙队也需要先喝接龙井的水健身强体,据说这样才能将黄绢龙舞得虎虎生威^{[7]192}。朗碧村

每年舞黄绢龙的风俗,就借着这样一个故事增加了很多神圣感和庄重感。

此外,人们还会把当地的一些农业特产也附会到钱镠身上。据说,吴越之前,临安等地出产的野葡萄味酸果小,难以入口,但是在一次鄞善国进贡时,果肉丰满的新疆葡萄深得钱王和戴妃娘娘喜爱,为了讨戴妃娘娘欢心,钱镠命人向鄞善国借种改良了当地的野葡萄。不久后,在九仙山下果然长出了优质的大葡萄。钱王派一个叫钱升的人专门监管葡萄的栽培,钱升举家迁徙到九仙山定居,随后人口日繁,后来这里也成了钱姓的聚居地,被后人称为“钱家头”村。而围绕着这个小村庄的葡萄园也日益繁茂^{[7]123}。这里的钱王又具象化为百姓的衣食父母,因为钱王的特意引进和管理,临安等地才能生产出果实丰满的葡萄。

除了把吃穿用度上的风俗附会在钱镠身上,百姓还会把一些世俗民情与钱镠联系在一起,仿佛为这些朴素自发的感情找到了依托。例如,江浙民间有凤冠梨不能分着吃的习俗,并且为它编制了一个忧伤又浪漫的故事。传说横街后朗碧村有几百亩凤冠梨,有一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被黛姓农户家的两姐妹挖回来一颗,种在院子里,天天精心栽培,到了第二年果然结出了两颗小梨。这时候,有一位僧人前来化缘,看到梨子后,说了句“有福之人果归一,护佑一方成大业”便离开了。一家人摸不着头脑,也没有深究。后来梨子长大成熟了,姐妹俩摘下来,姐姐和母亲一起分吃了一个;在父亲不吃的情况下,妹妹吃了整个梨。不想,后来村里来了一伙强盗,掠走了姐妹俩要到山里当压寨夫人。妹妹逃到一棵大树上躲过一劫,而姐姐则不甘屈辱跳崖身亡,姐妹俩骨肉分离,妹妹整日以泪洗面。后来,正好赶上钱王纳妃,钱王看中了妹妹,使她当上了戴妃娘娘,跟着钱王成就伟业。据说,戴妃出嫁那天,当年那个僧人又出现了,并且告诉他们,当年的两个梨子是姐妹俩修来的福分,只是不能分着吃,可惜,姐姐福浅,只能骨肉分离。妹妹因为没有分食,所以修成正果。从此,民间就有了不能分吃凤冠梨的民俗^{[7]127}。可能分梨的谐音为“分离”,所以,害怕离别的人们就创作了这样一个民情故事,并且把它附会在钱王的身上。而这些民俗民情借助江浙民间最为认可的英雄人物钱镠的故事,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英雄象征着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也承

载着人们对理想人格的期待。很多历史名人的传说故事带有英雄主义的叙事特征,成为人类精神寄托的载体。从叙事方式来看钱镠传说故事的英雄主义叙事,其中出现了一些类型化的叙事特征:生平事迹的神异化叙事与道德观念的转变。前者将主人公的才能和功绩描述为一种超能力,传达着叙事主体所认可的“神权天赋观”。而后者以及由此带来的一场身份的脱胎换骨的转折,则暗示着叙事主体所信奉、宣扬的道德理想和伦理观念具有操控主人公命运的力量。正是因为主人公遵从了这样的道德准则和伦理观念,才实现了从草莽盗寇到治国明君的蜕变。可以说,这些类型化的英雄主义叙事方式折射着叙事主体的价值建构和文化认同。

与此同时,钱镠的英雄主义还被附会了更多吴越地域的风物人情、民俗生活,尤其是在口头传说中,钱镠更像是一位能开山治水、惩恶扬善、守护百姓、亲近乡老的“父母神”。钱镠的英雄形象也因此带有了独特的地域特征和民俗性质。这些风物与人情的融入,不仅丰富了英雄形象,也表达了叙事主体对其心目中理想英雄的深切期待与亲

切情感。

参考文献:

- [1] 钱伊.吴越备史[M].北京:中国书店,2018.
- [2] 周清原.西湖二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 [3] 冯梦龙.古今小说[M].魏同贤,校点.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 [4] 欧阳修.新五代史[M].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5] 袁褰,周辉.枫窗小牍·清波杂志(历代笔记小说大观)[M].尚成,秦克,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6]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M].刘雄,尹晓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 [7] 许林田,施爱东.钱王传说集成[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
- [8] 叶舒宪.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原型重构[M].西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20.
- [9] 古吴墨浪子.西湖佳话[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 [10]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第六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6.

Heroic Narrative and Character Construction in the Legend of Qian Liu

HUO Mingyu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Academy of Arts,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Qian Liu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 in Wuyue region, and his legendary stories also exhibit certain heroic narrative features. Centered around the medium of Qian Liu, the narrator blends the objective reality with the artistic imagination, endowing the protagonist with the divine traits and supernatural power, and implying his heroic identity shouldering the “destin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and character, as well a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ecific folk customs and regional cultures in the protagonist, are highlighted in the narrative process, which can show that the heroic character has become a symbol of ethnic spirit, and also reflect the values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that different narrative subjects believe in. In the relevant narrative, establish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protagonist’s “destiny” and “character” implies the existence of some causal logic, that is, the protagonist’s character traits that conform to orthodox values, and moral concepts that fit folk customs and conditions are the reasons why he is endowed with the heroic destiny. Thus, the ideal character represented by the heroic figure becomes the spiritual totem that unites the ethnic group, maintaining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heritance of the ethnic group.

Key words: legend of Qian Liu; heroic narrative; character construction; cultural identity

(责任编辑 合 壹)